

##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乡村振兴

吴理财 吴 侗\*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健全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若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来进行检视和思考，不难看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其全面推进，是对我国以往推行的单一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纠偏”和“调整”，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和试错的结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必然。把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以往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固然有其特定的必要性和历史原因，但这样的发展却是以乡村凋敝为代价的。根据一系列统计数据所做的初步分析会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代价不但是高昂的，而且更会危害到现代化本身，谋求共同富裕与和谐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把乡村振兴提升到事关民族命运的国家战略当中。

**【关键词】**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年后的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当此举国振奋之际，人们对此一战略的产生原因也颇感好奇：为什么要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什么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和理解，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将它放置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放置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来检视和

---

\* 吴理财，政治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政治、乡村治理、文化治理；吴侗，政治学博士，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安徽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层治理现代化等。

思考。它源于中国现代化前一阶段演进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历史难题——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前一个百年的历史进程，乡村不但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反而日益走向衰败。为破解这一历史性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其所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的现代化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促进乡村现代化，最终实现城乡的融合协调均衡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 一 工业化进程中的乡村

如今，尽管大家都认为，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或“城市化”，更不能等同于“西方化”；但是，许多国家在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上，仍然要么是搞“工业化”要么是推进“城市化”（虽然具体的路径有所差别），甚至部分国家还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我国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曾走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单一“工业化”或“城市化”的弯路，正是对前期曲折历史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我党才最终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新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从工业化肇始的。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之所以会选择工业化道路，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要求和当时社会精英的认识有关。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起于鸦片战争还是开端于洋务运动，都是针对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的胁迫，试图将非西方社会纳入其殖民扩张体系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在这一过程当中，西方列强将其现代化模式引入中国，将封建主义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sup>①</sup>。然而，尽管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封建社会的经济模式并没有改变，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加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时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还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盘剥结合在一起，中国农民实际上遭受着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其生活愈发贫苦，乡村也走向落后衰败。诚如我国早期乡村社会学家冯和法所指出的那样：“今日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是很明显的事实。换言之，中国全人口的基础是在于农民，农民命运的颠沛，可以决定中国民族的兴衰。农民怎样可以解脱重重桎梏，间接巩固中国民族的基础，这是我们所当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sup>②</sup>

中国经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经引起社会精英激烈的争论。章士钊和当时搞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等人主张复兴乡村，振兴农业以发展工业；吴景超、张培刚等人主张发展工业，认为振兴都市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6页。

② 冯和法：《农村社会学大纲》，黎明书局，1934，第23页。

业才能救济农村。这场论战前后持续 20 余年，直至人民政权的建立才告一段落。

在当时，虽然人们对于工业化道路还有诸多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无论是在这场论战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工业化论调始终占据主流。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都是选择工业化战略。我国近代工业化开端于洋务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乃至民用工业的发展。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在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观念指引下，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基础（且不论这些工业基础是否被官僚资本所控制），但后来几经战乱，到 1949 年这些薄弱的近代工业几乎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多少经济遗产，当时中国的工业指标已落后于同期的印度，遑论跟美国的差距。<sup>①</sup> 1950 年美国人均钢产量为 538.3 公斤，印度为 4 公斤，而中国 1952 年才 2.37 公斤；1950 年美国人均发电量是 2949 千瓦时，印度是 10.9 千瓦时，而中国 1952 年仅 2.76 千瓦时。<sup>②</sup>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启的。新中国在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走工业化道路，而且以重工业优先。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三年短暂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开始了新中国的工业化，逐步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骨架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49 年 3 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就曾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sup>③</sup> 诚如周恩来所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sup>④</sup> 1954 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sup>⑤</sup>。

不久后，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认识到了不能把工业化作为唯一的建设

① 黄群慧：《新中国 70 年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光明日报》2019 年 7 月 9 日。

② 余惠敏：《第一动力——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纪略》，《经济日报》2020 年 1 月 3 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 1437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 133 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 136 页。

目标,甚至提出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sup>①</sup>但在实际上并未改变工业化优先的方略。

在今天看来,现代化并非就是单一的工业化。然而,“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等同起来的倾向,可能源于把过程中的某个因素当成整体的习惯。在习惯用法上,这个词同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同义……对于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每个公顷和每个劳力的农业生产的指数增长,已经至少证明与以工厂为基础的生产增长同样具有意义”<sup>②</sup>。在我国工业化初期,没有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不可能有工业的发展。

1949年,新的人民政权成立。此时的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之上。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即使到1952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占35.5%。<sup>③</sup>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从农业抽取积累、从农村汲取资源,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和实现赶超战略的需要。为此,国家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合作化乃至集体化“改造”,最终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做了清楚的论述。他认为国家的工业化一定需要农业的合作化来支撑来保证,因为它提供商品粮和原料,它为工业化提供市场,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一五”时期,所实行的“一化三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质上是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即“一化”),同步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三改”)。从1953年开始,农村开始进行农业合作化。合作化开始之初是以农民自愿为原则,渐进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建设,宏观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业则实行“类工业化”的改造,将农业生产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组织起来,并从农业、乡村汲取资源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

① 早在1954年,周恩来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32页)。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68页)。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完整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39页)。

②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6页。

③ 彭明:《总序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的中国》,载朱汉国、李少兵等主编《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00-1949)》,人民出版社,2010,第11页。

从工业化本身来看，这一时期走的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个时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封闭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1949~1952年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重建。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尽管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阻碍乃至打断了工业化进程，但经过近30年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设起来，特别是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巩固了国家政权；资源勘探工作成绩明显；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邮电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同1952年相比，1980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千瓦时；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多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sup>①</sup>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探索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我国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工业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实力显著提升的关键产业。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市场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近些年，注重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注重中国科技创新，促进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根本性转变，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突破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重要关口。2016年越过70万亿元，2017年越过80万亿元，2018年越过9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6%。<sup>②</sup>2020年，面对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5986亿元，

<sup>①</sup> 黄群慧：《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光明日报》2019年7月9日。

<sup>②</sup> 《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01/content\\_5404949.htm?eqid=a22bc3860000238b00000005647d9855](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01/content_5404949.htm?eqid=a22bc3860000238b00000005647d9855)。

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sup>①</sup> 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210207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5698 元。<sup>②</sup>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的因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一进程之中，农业农村仍然为我国工业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和流动出来的大规模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新工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者；还有一批从农业、农村中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转型升级和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新主体，丰富和改善了我国工业经济主体的结构，使之更具韧性和活力；同时，我国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在乡村，农民的工业品需求的更新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

## 二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

接下来，再将乡村振兴放置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进行审视。

严格而言，我国城市化源于农村改革。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严格控制城乡人口的相互流动，特别是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我国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50~198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从 28.4% 上升到 41.3%，其中发展中国家从 16.2% 上升到 30.5%，但是我国内陆地区（不含港澳台）仅从 11.2% 上升到 19.4%，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农村土地家庭经营制度的广泛推行，不但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而且使一大批农业劳动者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由于受限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一开始主要是推动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1980~1996 年，乡镇企业创造了 1.3 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村就业的 1/3 和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 6008 亿元，总产值高达 1.8 万亿元。1980~1988 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 32%，1988 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镇企业提供的电风扇占全国的 45.5%，丝织品占 68.7%，呢绒占 52.1%。1997 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 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 35.8%。一大批小城镇、“新城”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迅速兴起，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化进程中耀眼的“新星”。

后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和消解。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04.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04.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经济开发的大力推动之下,从沿海发达地区首先兴起的城市化热潮快速向中西部地区扩展、蔓延。1992~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由于受到传统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其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sup>①</sup>“十一五”时期继续延续这一发展思路。“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强调大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sup>②</sup>这个时候,不仅强调大城市的发展,而且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建设城市群。于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一批都市圈迅速崛起。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启动的中国城市化,最初是由农村改革促动的,但很快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发现了城市经济开发的巨大发展动能,企业和资本也从中发现了优厚的发展商机和潜在的利益,城市化因此而具有了自我扩张或自主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是城市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内蕴着从大城市到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以至国家中心城市的扩张升级的冲动。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人口、土地等各种要素和社会资本都被虹吸到城市,从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农业兼业化(或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调整了城市化发展政策。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城镇化质量成为新时代城市化的战略重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同时要求“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sup>③</sup>2013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sup>④</sup>

这些论述,在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18页。

②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984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524页。

④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第23页。

(2014-2020年)》中得到了系统梳理和体现,“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共识。该规划认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sup>①</sup>由此可见,国家从过去的单一工业化、城市化转向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开始进行综合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现代化探索。

2020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圆满收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就推动户籍改革提出明确意见,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鼓励有条件的I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sup>②</sup>于是,我国城市化从单一的数量或规模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高和内涵的建设,追求一种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

历史地来看,迈进21世纪以来的头10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2002~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我国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了50%,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我国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表示我国正从“乡村中国”快速迈进“城市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升至2022

①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

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发改规划〔2020〕532号)。



年的65.2%，提升了12.1个百分点，城市数量又新增了30余个。从2022年的有关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北京、天津这三大直辖市的城市化率均已超过85%，比肩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广东、江苏、辽宁、浙江、重庆、福建6个省份的城市化率也都已经超过70%。进入新时代，我国城市化转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城市发展活力不断释放，城市服务功能持续完善，城市人居环境更加优美，城市发展韧性不断增强，城市发展质量稳步提升。<sup>①</sup>

总体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农村改革肇启和促动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大批新兴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这个阶段，大量的农民工游走在城乡之间，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又促进了乡村的发展。应该说，这个阶段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对自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第二阶段转向大城市的快速扩张，一直持续到2012年前后。在这个阶段，城市对乡村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应该说，这个阶段的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开发、土地财政以及资本逐利交互作用的结果，带有“野蛮”成长的特点。第三阶段朝着提质增效方向调整，注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和“四化同步”，逐渐扭转了牺牲乡村利益发展城市的跛脚式城市化轨道。于是，乡村振兴战略随之应运而生。

### 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乡村振兴

在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文明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与传统农业社会密切联系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往往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解体、调适或重构的困局和压力。近代以来，我国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也曾走过一段以单一的工业化、城市化或工业—城市化优先的现代化道路，这期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严重的“三农”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三农”问题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我国现代化前期探索的必然产物。<sup>②</sup>

在这一现代化探索时期，工业化乃至城市化都是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下展开的，基本上都是把工业化、城市化作为外在于乡村的一个发展过程来推动

<sup>①</sup>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就业局势保持稳定——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fx/kxfzjhh/202303/t20230301\\_1920337.html](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fx/kxfzjhh/202303/t20230301_1920337.html)。

<sup>②</sup> 王先明：《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372页。

的,也就是说,我国乡村被长期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靠城市来发展工业,我国农民实际上没有直接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用牺牲农业来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这不仅导致农民负担增加乃至过重,而且导致农业增长缓慢乃至负增长,乡村必然发展落后,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这就衍生出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的历史命题——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前一个百年的历史进程,乡村却日益走向衰败。<sup>①</sup>

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一五”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认识到单一的工业化的局限性,提出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向着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推进。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搞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还认识到,中国搞现代化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早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就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sup>③</sup>1979年3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sup>④</sup>他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sup>⑤</sup>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又先后提出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等新的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sup>⑥</sup>。进入新时代以后,进一步强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最终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① 李克强:《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0,第144~146页。

②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第19页。

③ 刘宗发、张艳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光明日报》1999年2月19日。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6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64页。

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业部,  
[https://www.moa.gov.cn/ztlz/2016zyyhj/hgyhwj/201301/t20130129\\_3209958.htm](https://www.moa.gov.cn/ztlz/2016zyyhj/hgyhwj/201301/t20130129_3209958.htm)。

伟大复兴”<sup>①</sup>。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把乡村振兴放置在中国现代化探索和推进进程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其推行，是对我国以往推行单一的工业化或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纠偏”和“调整”。单一的工业化或城市化，其结果都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乡人民都要共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它既包括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的现代化，是城乡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诚如王先明所言：“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居于什么位置，是任其自然萎缩、衰败、淘汰，还是促进其发展、进步和转变；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还是将其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将面临的重要课题和难题。前者的后果将使现代化失去稳定的基础和强大的发展动力，后者的结果恰恰相反。”<sup>②</sup>毋庸置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必须将农业、农村和农民纳入其中，积极推进乡村现代化。而且，它强调乡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乃至信息化同步、协同和交融发展。

然而，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没有跟上，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当前我国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的正确判断。也正是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积极、全面地推进乡村振兴，它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能否顺利达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还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现代化或农业农村现代化。实际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民现代化。也就是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然要求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或可将之简称为“乡村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观照之下，我们认识到，乡村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被城市所取代，亦无须被城市所取代。乡村不是凋敝落后的代名词，完全可以与城市一样，建设成为现代生活的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21页。

<sup>②</sup> 王先明：《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373~374页。

重要承载地。2022年,我国农村户籍人口7.6亿人、常住人口4.91亿人,未来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还将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也向往在居住地就能过上现代化生活。要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高乡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努力将乡村打造成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的幸福家园。<sup>①</sup>简言之,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什么人们对乡村怀有浓浓的“乡愁”?因为乡村是人类一种不可替代的、值得珍视的且可欲的生活方式。它不但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而且需要得到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乡村、记忆中的故园。”<sup>②</sup>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基因密码,也是新时代提振乡村精气神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逐渐衰落凋零,一些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正在加速消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进一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积极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sup>③</sup>换言之,在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即如何对中国“乡村性”进行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以推进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

##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Wu Licai, Wu Dong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strategy for improving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f we examine and think abou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from a broa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ts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is an important “correction” and “adjustment” to the sing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trategy previously pursued in China, is the result of the exploration and trial and error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ath, and is also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lthough there

① 胡春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5日。  
②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第100页。  
③ 胡春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5日。

are specific necessity and historical reasons for mak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past, such development comes at the cost of rural decline.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based on a series of statistical data will lead peopl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st of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not only high, but also endangers modernization itsel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hich seeks common prosperity and harmonious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ust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at concerns the fate of the n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